

### 第三节 遍地风流或遍地枭雄：现代之后果

王安忆在《遍地枭雄》的小说后记中写道：“倘若多年前，阿城的小说《遍地风流》不那么著名的话，我的这个长篇，就要叫做《遍地风流》了，当然，此“风流”不是彼“风流”。“枭雄”的意思多少要狭隘一些，也直露了一些，但还切我的本意。我本意不止是指那四个“游侠”——“遍地枭雄”这名字真有些像武侠小说，其实我并不热情武侠，总觉得武侠是另一路数，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属神仙志怪；但要是从现实出发，想象武侠的前世，也当是在你我他的世界里，不知怎么一脚踩空，跌进异度空间，比如那个叫做“江湖”的地方——我本意却不仅在此，更在“遍地”这二字，就是说处处英雄业绩。当然，这“英雄”也不是那“英雄”，这“英雄”大约可用“大王”这个人作说明。大王就是崇尚霸道，“大王”不过叫叫罢了，只能自领了那三个小枭雄，也不能像古时的侠客云游天上，而是在地的隙缝里流窜，在现代社会的夹缝中苟活，最后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遍地枭雄》如王安忆所说，取了一个武侠小说的名字，但是它毕竟不是武侠小说，而是一篇反映社会现实的写实小说。小说中有“英雄”，但是并不是可以飞檐走壁，侠骨柔肠的救世英雄；小说中有“冒险”，但是并不是穿墙走壁，穿着夜行衣，躲过敌兵的冒险；作者把几个“枭雄”的故事放在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中来写，就注定了这个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城市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心血来潮的，社会是有其根深蒂固的必然原因和条件的。就如封建社会的几千年架构不可能因为几个农民的起义就土崩瓦解的，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不是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就可以烟消云散的。而现代的城市秩序，不可能因为你的“出轨”就可以改变的。第一座城市的建立距今也有五千年的历史，城市现代化的完成确是近几年的事情。现代的城市有其固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原则，价值取向，市民们的审美观念，欣赏趣味都受其决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

都市生活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个社会生存规律像蝴蝶效应一样，屡试不爽。

然而现代的都市生活，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个人的生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是束缚，人的真正本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压抑，人渐渐成为了物，像工厂流水线上的部件一样，成了没有自己灵魂的、无法支配自己的零配件；另一方面，高度发展的生产又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人们渐渐成为了商品拜物教者，好像人都是为商品而生存，人的个性被淹没，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社会的现实性决定了以毛豆为代表的一批人的“出游”，他们作为社会的新鲜血液，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希望过属于自己的自由理性的生活，可是城市的现实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着他们，使他们身心疲惫。没有了生存的斗志和生活的热情，每天浑浑噩噩，不知所谓。于是都幻想着重回最原始的生活状态，幻想着冒险，幻想着游侠，幻想着自由。可是一旦他们像毛豆一样“出游”，找到真正的自己，他们就站到了“法”的另一边，违背了现有的社会秩序，违背城市发展的规律，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毛豆和“三王”最终难逃法网，落入窠臼，是必然的。

王安忆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带给人们惊喜，一个好的作家可以把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写到部部都让人叫绝，作品之间互相看不见彼此的影子。《遍地枭雄》是一部正面描写“出游”的小说，这个出游的故事却切切实实地建立在王安忆有关城市感受的体悟中，或者说，城市处处偶然的可能性造就了出租车被劫案突兀中的平常、刺激中的兴奋。城市是这个故事的潜在背景，确同时是这个故事的大牵制，没有上海这座城市，就没有“遍地枭雄”，也就没有小说成就的现实可能性。这是一部揭示现实的小说，揭示都市生活的无奈与逃避，反映广泛存在的社会现实，人们想逃离，想背离城市的秩序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社会现实，社会规律，社会秩序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只能遵守它，一旦违背，就会受到惩罚，像毛豆和三王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教材和警示。所以《遍地枭雄》不是武侠，不是神话，是社会现实的后果，是一部警示录，警示想逃离的人们和逼着人们要逃离的社会。

## 第三章 都市空间与文学想象

都市如同一个文本，作家与城市的关系，首先是阅读城市，然后才是对城市的书写。都市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以及消费模式、大众文化传播手段，都市的生活节拍、声光形色，或者说都市的性格，给了他们一种特殊的感悟力和胸襟、视野和立场，决定了他们的作品的性格，并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艺术表现形式，进一步而言，可谓无形中形成了一种“都市诗学”——书写都市题材，表现都市意象，体现都市的节奏、风格，这也就是“都市性”的内涵之所在。诚如沙柏和华洛所说，“城市就像一个文学的文本，拥有众多相异的诠释和读者，随着这个文本和读者演绎的层出不穷，我们的视野将得到不断的扩展和补充，”我们要了解王安忆作品中的城市想象，必然要弄清楚都市的特质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而都市的空间结构是都市特质的中心环节，所以首先明确了城市的都市空间，才可以进一步了解作品的城市想象。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联结状态，是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投影，是城市社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城市空间结构一般表现在城市密度、城市布局和城市形态三种形式。而城市空间结构的差异表现为城市规模，城市职能，城市地理环境的不同。<sup>[1]</sup>城市的发展，都市空间的变化，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观念，对速度和距离的估计也改变了我们的美感经验。崭新的特质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物我的关系不断调整，重新影响了我们对外界的认知方法。王安忆的三城小说，面对着不同的城市空间，为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城市想象。

### 第一节 隐晦与呈现

上海、香港、新加坡是三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地理环境，社会际遇，决定了三城空间结构的迥异，也就决定了在王安忆笔下塑造了三座不同的城市想象图。但是社会的政治形态，社会的舆论基础，社会

<sup>[1]</sup> 李健建.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结构研究.[J].上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21

的历史现状又限制着作家的创作，什么是可以写的，什么是隐晦不可以写的，都决定于城市空间所赋予作家的权利。

2001年11月，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第五届文学奖。对于这一结果，王安忆显得平和而坦然：“我很高兴得到这个大奖，但却也觉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以来……一直以诚实的劳动对待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句子，写作贯穿了我的生活。所以回报来的时候，虽是意料之外，却也感到是情理之中。”矛盾文学奖给《长恨歌》这样的答案和评语：

《长恨歌》体现了人间情怀，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从一段易于忽略，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长恨歌》的作者用自己独到的叙述方法，抒写了一位四十年代平民出身、美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的不幸的一生和悲剧的命运。其间，包含着对于由历史和传统所形成的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sup>[2]</sup>这一评价传达的是一种新的、颇具意味的信息：在一个变迁的、急遽发展的时代中，文学对城市的表现和重构。尤其是像对上海这样有着悠久的中西交融历史的城市的描写，正在引起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在王安忆80年代的作品中，已隐约托出她对上海的深切感情。流徙四方的知青，原来是无数上海穿堂弄巷出身的儿女。而90年代的王安忆，则越来越意识到上海在她作品中的分量。其中的一些作品寻找母系之根一直到远古时代，写作的视野徒然开阔。一个由外来户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徙、交易、遗忘历史的城市，百年来的沪上繁华沧桑，其实就是一页页的移民史。王安忆对被“忽略”、“遗忘”的市民文化。移民历史的关注和敏感，却未提及她个人的“移民史”在这一趋势中的作用和意义。王安忆本人的个人成长经历，移民历史在她的作品中发挥着“直接”而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个人情感因素都被作者隐晦的表述于作品中，一句普通的对白，主人公一举手，一投足，也许作者正想为我们呈现什么。

据王安忆自己的描述，她的童年是有些寂寞的，这不仅是因为，“妈妈天不亮就走了，天黑才回来。雯雯见不到妈妈；爸爸天黑了才起床，天亮了才睡下，雯雯见不到爸爸”，而且在于，她这个“同志”的后代，自“坐着痰盂进

---

<sup>[2]</sup> 王安忆.遍地枭雄.[J]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248.

入上海”的一刻起，似乎便“命定”地置于了两重世界中：一边是说普通话的家和“同志”的世界。一边则是有着久远的繁华历史的上海“本土”的市民世界，两个世界互为隔膜而难以融洽。那个琐屑、“精致”、根基复杂的“本土世界”，仅仅因为“同志”的家在上海没有亲眷及日常所说的不是如他们一样的上海话，就将他们及其后代“排斥”在外。“我们家的小孩子和‘同志’家的小孩子在一起玩，我们使用的不是上海话，而是一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这样的语言使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和里弄变得孤独”。<sup>[1]</sup>而“同志”的世界由于代表了新生的政权和社会，对于那个与就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市民世界亦表现出了“警惕”和反对“融合”的趋向。“母亲还不准我和邻家的孩子往来，以为他们会带给我不好的影响，至于这不好的影响是什么，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没有弄清楚。因此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内心就处在一种紧张状态。”“同志”的世界和“本土”的世界就这样割裂地并立在王安忆的童年世界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

《长恨歌》中，王琦瑶对普通话的敏感，显然和王安忆童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当萨拉第一次来到王琦瑶家，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这就无形中拉开了他和王琦瑶、严师母、娘娘舅之间的距离，而萨拉的政治身份就更加使他们成为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王琦瑶对萨拉的残忍，主要原因也是出于萨拉的“外来人”身份，他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萨沙是作品中众多上海人中的例外，王琦瑶等上海人对萨沙态度，和萨沙的痛苦以致逃离上海，都影射了王安忆对于城市身份和城市阶层的态度，深入的将说明了王安忆的寻根思想，想了解我到底是谁，我在哪里，我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

《长恨歌》乃是一部富有“象征意味”的小说，它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出昔日“上海小姐”一生浮沉的同时，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布尔乔亚女性和城市的关系。而以王安忆自己的说法“《长恨歌》很应时地为怀旧提供了材料，但它其实是一个现时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软弱的布尔乔亚覆灭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小说中的呈现就是王琦瑶直接的死于长脚的“他杀”。王琦瑶这样的上海人最后被无产阶级所影响，王琦瑶为了追求“老克腊”心甘情愿

---

<sup>[1]</sup> 郜元宝，作为小说家的“本性”——重读王安忆的小说[J] 上海文学1991，12

的贡献出自己的“依靠”——黄金，而“老克腊”最终的逃避又表明了上海阶层性和无产阶级软弱性。上海的“深度”表现在它的中产阶级性里，表现在“王琦瑶”这样一群布尔乔亚女性身上，同时或更大程度上是由老克腊，萨沙这样的人来“呈现”的，或者说，唯因他们的加入，追捧，城市的中产阶级的特性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通俗的说，《长恨歌》是在讲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故事。一个女人如何和几个不同的男人周旋，如何被一个又一个男人抛弃，最后死于非命。其实《长恨歌》也是在写一个女人和城市的故事，一个女人和城市历史的故事。王安忆自己表述“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事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城市的影子”。在这篇作品里，王安忆把王琦瑶与上海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第一次明确提出女人和城市是一体的，女人是城市的代言人。小说以女性的委婉和“小感觉”来对城市进行书写，小说的每一个角落都回旋着种种女性对于这个世界的小感觉，人们可以细腻地品味勾勒这个城市的一笔一画，但是，人们找不到一个精神的制高点纵览这个城市的历史风云。上海是一个女人的城市，上海城市为女性提供了空前的机会，但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利结构中，城市的经济、文化更多地掌握在男性的手中，上海城市的性格和律动因而更多地呈现出“男性化”的一面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或者说当社会男性失去了他们施展身手的舞台，城市的风貌变得一味的“女性”，则暗喻了城市正处于某种“暧昧”的状态之中。王琦瑶的命运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城市的悲剧，王琦瑶无论多么聪明，拥有多么坚强的性格，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伤心太平洋》是一部新加坡的历史史诗，小说中用回忆的方式以新加坡的历史为社会背景来讲述一个家族的盛衰。王安忆充分利用小说所赋予的“虚构”的权利，进行故事的讲述，尽量为我们还原一个家族的“真实”面目。作者在尽力的写一个家族的历史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写家族背后的城市——新加坡。新加坡的历史是千疮百孔的，新加坡的人民是备受折磨的，过去的新加坡是不可与今时今日的“花园城市”同日而语的。但是城市小说的创作深受城市

空间的影响，城市的历史包含了太多的政治，政治中包含了太多的限制和禁忌。所以在《伤心太平洋》中，作者充分利用隐晦的“象征”手法来谈政治，谈新加坡的部分禁忌的历史。整部作品给人一种灰暗、压抑、萧条的基调，语言隐晦。“我爷爷从高处往低处走，他俯视着新加坡这地方，他看见不远处岛屿的边缘，白亮灼眼的海水，他一阵眩晕，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涌上心头。汽车打道回府，坡路上只剩了他自己，没有对手的谩骂着，一步一步地下了山，沉没在嘈杂喧嚣、雾气蒸腾的街心。”“太平洋是令人神往的大洋，它是地球上最广最深的海域……我不由想：岛屿是多么危险的东西啊！它无时无刻不面对着沉没与冲击，它在波涛的喘息间歇中苟活。岛屿像一个孤儿，没爹没妈，没有家园。太平洋上的岛屿，全有一种漂浮的形态，它们好像海水的泡沫似的，随着波涛涌动。”<sup>[1]</sup>《伤心太平洋》如题所示，新加坡是一个伤心的城市，“新加坡的地底深处，埋藏了无数具尸骨，这些尸骨几乎使这岛屿的地面隆起，这岛屿就像是海洋里的一个巨大坟墓。在尸骨之上，新加坡再也难以安眠，新加坡的夜从此变成惊悚之夜。无数冤魂在这岛屿的上空飘荡，凄惨得哭泣着。”<sup>[2]</sup>这些元会在有限的空间内要表达尽可能多的故事，诸多禁忌的城市空间内展开一个城市的想象，隐晦与呈现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隐晦是为了更好的呈现，呈现是为了隐而不晦。王安忆很好的在自己的作品运用了这种手法，为我们书写了城市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深度的描绘了城市的想象。

## 第二节 都市结构中的个人与集团

人类自脱离原始存在以来，就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处于被异化的生存状态，丧失了自我。于是，寻求真正的自我、认识自我就成为一个终极的追求。但是，自我并不是孤立的实体，他与其他人已经纠缠在一起，无法截然分开。这就意味着只有通过对他人的认同才能达到自我认同。在现实世界，由于受到主客关系的制约，不可能实现主体间的互相认同，也就不能实现自我认同。

---

<sup>[1]</sup> 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J].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560

<sup>[2]</sup> 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J].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672

当你把他人看作客体时，自己也被物化，也不可能真正地认识自我。对自我的了解不是通过笛卡儿式的自我意识获得的，而是通过主体间的互动交往、理解获致的。

所以现代哲学扬弃了主体性哲学而建立了主体间性哲学。20 世纪以来，人类逐渐培养起一种自我批评性，面对科学技术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手段的发展，人们力图理解和解决威胁整个世界与人类的种种危机，纠正物质生产片面发展对人际交流的损害和“主客”关系对“主体间结构”的消解。当代对科学主义霸权的批判与人文主义思潮的一再张扬所体现的人类的种种努力，都使对话和交往成为当今世界的中心话题。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家们开始关注更具本质性，也更难以解答的问题，即一个主体是怎样与另一主体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由此，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便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当代哲学的视野。现代哲学就更多的表现为主体间性的认识论哲学，它将存在视为是主体间的存在，从而使主体性认识论下孤立的原子主体变为交往互动行为当中的互动主体。

在哲学领域，主体间性哲学的产生，为我们更好的了解都市中的个人与集团的关系提供了条件。现代都市是文明的风暴中心，它创造了文化和文明，也毁灭文化与文明；都市从来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代表了物质文明，是繁荣的象征，另一方面又是精神的沙漠，是人间的炼狱，你歌咏它也好，诅咒它也好，都无法改变它的本色，你不能抗拒它，只能被它改变、所支配。沃斯和西美尔都对都市生活的特性有过精辟的论述，沃斯在其影响深广的论文《都市主义为生活方式》中，认为都市的社会关系是大数量、密集和异质性的。他指出“大数量解释个体之差异，相对缺乏亲密的个人认识，大致上是匿名的、虚假和短暂的人际关系片断化，以及相关特性。密度包含差异化和分化，密切的实体接触和遥远的社会关系同时发生，隔离的复杂形式，正式社会控制的支配性，以及明显的摩擦等其他现象耀眼的对照。<sup>[1]</sup>异质性趋向于破坏严格的社会结构和制造社会流动，不稳定和不安定，以及个体归属于各种各样交叉横切的社会群体，而且高度的成员转化率。金钱上的连结代替了个人关系

---

<sup>[1]</sup> 西莫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J].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08



和制度，而且机构趋向迎合大众而不是个人的要求，个人因此唯有经由有组织的群体行动才有效率。”这就是说，都市生活是有异质的个体所构成的，在都市中个人是孤立的、匿名的、我们走在大街上永远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面孔；在这个社会中，非人性的金钱原则支配着人们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短暂的、疏离的，个人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

城市的空间结构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现代城市的现状，为作家的城市想象规划了“蓝图”。王安忆的三城小说，主人公做为一个被虚构了的个体，但是他们又是现实存在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其代表性，代表了以他为典型的一大批人。《遍地枭雄》中讲述的是一个“出游”的故事，一个异质的城市中，人与社会，人与集团，人与人的冲突和妥协。王安忆为我们再塑了一个真实的社会关系网。毛豆一个懵懂的少年，生活在上海市郊的一个普通的失地农民家庭，从小受父母和姐姐的宠爱，是一个单纯的涉世未深的青涩男子的想象。读完高中毕业，无所事事，为了工作而工作，进了一家日资蔬菜公司做事，这是毛豆进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小说中毛豆第一个面对的社会集团。小说中这样描述“活计不重，可以说很轻，只是将一种二寸来长一寸来宽，碧绿的叶子，叠成一摞一摞，归置起来。这叶子是日本人用来垫菜盘子的，特别要讲卫生。所以还发了天蓝色的衣服，帽子，白口罩，白手套，天天要洗澡，工资也令人满意。可却是闷得很。翻来覆去这一个动作，来上多少遍才填得满八小时？心里就盼望着换另一种叶子来做，可就只有这一种叶子。一袋一袋进来，一盒一盒出去，永远不会结束。”王安忆寥寥数笔就为我们勾勒出了这个工厂的工作流程及性质，个人像是流水线上的部件一样，成了没有自己的灵魂，无法支配自己的零配件，个人在集团中完全失去了自我。另一方面，高度发展的生产又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人们渐渐成为商品拜物教着，好像都是为了商品而生存，个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在这个社会集团中工作，金钱物质成了连结个人与集团的纽带。韩燕来也就是毛豆，因为机械单调放弃了这份工作，可是更多的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们不得不做机器上的一个颗“钉子”。离开了别人开的公司，他们几个人开始筹划着合伙做生意，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工厂，开工厂的初衷是因为自己想当老板，当老板可

以自由的上班下班，不必按钟点，这点自由成了他们工作的动力，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这不正反映现实生活中个人的生活现状吗，人们的个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束缚，人们越来越渴望自由和解放，个人与社会集团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毛豆所代表的一代人渴望脱离常规的欲望，这些都为毛豆的出游做了铺垫。三王的出现，给了毛豆一次“神游太虚”的机会，让他产生了脱离社会集团的欲望，并真正的付出了实践。大王、二王、三王，三个人构成了一个小的社会集团，这个社会集团是与现实社会集团相对立的，它没有按时上下班的要求，不必按钟点，不必做机械的工作，那是一个自由的，解放的社会，是现实人们向往的生活状态。毛豆成功的成为这个社会集团中的一员，过上了不受束缚的生活，而且最重要的，让他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热情 and 情意，在这个小社会集团中，人与人是合作共存的，没有分工不均，没有分配的不公平，人与人，人与这个“社会”是和谐共存的。王安忆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小社会集团，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冒险的机会。但是《遍地枭雄》不是武侠不是科幻，它是一部反映现实的小说，小说的结局为其现实性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当毛豆被带上警车，面对着现实中的人和物，是如此陌生。可是城市的现实性决定了他们“出游”的结局，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现实社会集团的无奈，人们想脱离又无法摆脱的痛苦和挣扎。

王安忆的三城小说，都是在写人与城市的故事。通过人的故事来写城市，来展开城市的想象。而城市是由无数的社会集团所组成的，在城市中，个人必然要与社会集团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作家们必然利用这二者的关系来书写城市，和这个城市中的人们。王安忆也不落窠臼，充分的利用城市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来为我们书写三城的想象。

### 第三节 空间重组与文学景观

王安忆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创作以来便一直处在文坛的中心，对“故事”的执着更使她渴望“挑战”，她曾感叹“城市无故事”，同时坦言：“我做作家其实是要获得一种权利，那就是虚构的权利。”而“我所说的

说，究竟能为今天人们的日常精神提供什么呢？一方面，它绝不是纪实的，它是虚构的，它刺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它使人感到是无中生有，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它又是虚拟的，它所描述的是比生活中的现实更为现实的带有真理性的东西。”而在她的《纪实与虚构》的后记里，她讲述自己为小说命名的过程，最后定下此名，是因为她认为“纪实与虚构”乃是“创造世界的方法之一”。“野心”。<sup>[1]</sup>这些创作的理念，引导着王安忆进行三城小说的创作，她利用小说所赋予“虚构的权利”对城市空间进行重组，以使城市的发展，故事的情节按照自己的构思进行。三城小说就在作者的空间重组下，呈现出不一样的城市色彩。

香港是一个充满是非的城市，是一个难说而人人争说的“新故事”，王安忆显然难以不受“诱惑”和放弃“虚构的权利”。《香港的情与爱》被是在这种诱惑下创作的，但它并非仅是“诱惑”的产物，同时也是主动“寻找”的结果。《香港的情与爱》讲述了旧金山华侨商人老魏与上海去的新移民逢佳在香港相逢而同居的故事。。说罢，他竟难以自禁，热泪盈眶了。看老魏这样一个饱经风霜，从来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在风花雪月后独自“热泪盈眶”，人们也不禁要为之唏嘘和感慨了。在共同生活了两年后，老魏帮助逢佳办妥了前往澳洲的手续，从此鸳梦不再一排两散。老魏“很清楚，倘若不是为了交易，他俩是不会走到一起来的”，交易完成各自走人本在“预计”中，但还是让从一开始就“清楚”的他嗒然若失。老魏并不是不接受交易，“但是他要这买卖谈得长久一些。拖泥带水一些，讨价还价的回合多一些。稍稍波澜迭起那么一些”，事实上，两人的买卖不仅曲折有致，而且深入到了“心里”，虽然摩擦多多，却在不期然中产生了一种相濡以沫的感情。老魏知道这在自己的生命中是“最后一次”了，而正是这最后的一次，使他几十年的漂泊似乎都有了回报，对香港的感情也变得感伤起来。故事的末了，老魏坐在回旧金山的飞机上，听着一个人在数落香港：当他讲到没有人爱香港的时候，老魏却回过头来，说：有一个爱香港的，那就是我，我爱香港王安忆虽然不是香港本地人，但对香港历史文

---

<sup>[1]</sup> 李欧梵.上海摩登.[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8

化的探讨却抱有了和当地人几乎同样的热情，甚为主动地介入到对香港这个城市的特质、限制、潜力的评说热潮之中。在老魏和逢佳的故事之外，《香港的情与爱》并引入了直接的关于香港的描写和议论。这里“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婚礼……它的音乐是二十年代的爵士乐，强烈，即兴，还有点忧伤。这忧伤是热闹里的寂静。快乐里的不快乐的那种，有点甜蜜的。它的灯光是通宵达旦的，也在演奏着爵士乐，夸张地表现切分音符，使它带有一股难言的激动……香港的热恋还是带有私通性质的，约会也是幽会。在天涯海角。是一个大艳情。”总之，这天涯海角的香港到处是传奇，繁华传奇几乎到了“不真实”的地步，一直必须要用一种相对“朴实”的东西来“充实”。而上海新移民逢佳就是这传奇里的一点真实，有了她，香港的传奇才更加可靠，香港这座城市的传奇性才更加真实。

王安忆在小说中以两个过客的情爱故事来喻示、解释香港，通过作者的认识来对重置香港的城市空间。在作者笔下，香港这座城市，是一个“过客”的城市，一切都是暂时的、过渡的，情爱如此，社会政权和历史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香港在作者的空间重置一下，成为一个传奇和充满奇遇的城市。

城市学家认为：“对于一个聚集地的感知……这种感觉中的元素能够和其相关的时间和空间的精神感受相联接。并进而去理解其非空间的观念和价值……这样的感知过程完全依赖与跟人对城市的感受。”“这样的情感活动，除了从人与场所之间的交互活动获得之外无从分析起。”<sup>[1]</sup>作家的创作不可能是纯理性的科学分析，更多是包含了作家自己的情感活动。王安忆的城市想象，都源于作者对这所城市的感情。上海是王安忆一直“追寻”的城市，幼时“外来者”的身份，给她的内心带来很大的触动，她渴望融入上海的日常生活中，渴望了解弄堂里高墙内的柴米油盐，虽然时过境迁，王安忆对上海的感情和印象仍是特殊的，她对上海的去充满了幻想，对未曾参与的上海生活充满了遗憾，《长恨歌》满足了她对上海的所有想象。王安忆选取几个极具代表性的场景，运用蒙太奇的手法把他们组合在一起，为我们上映了一部关于上海小城的故事。一条条神秘的弄堂，一间间布满秘密的闺阁，俯视全城的鸽子，无处不

---

<sup>[1]</sup> 王晓明,陈清侨.当代东亚城市[J].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151

在的流言，和一个布尔乔亚似的女人。这些场景在上海的城市空间内重组，通过女人的“小感觉”，和这个女人的日常琐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日常的，没有战争，没有政治，一个完全怀旧的浪漫的小上海。

所以不得不感叹，王安忆有一支神奇的笔，在她笔下一字一句一副画。一篇文章一个城市。上海是一个日常的“小上海”，香港是一个传奇的“探险岛”，新加坡是海上漂浮的。



## 结 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城市作为经济主体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大都市”计划在不同地方流行着，与此同时，城市的地域文化负载功能也得到进一步的表述和阐释。城市不但组织着人们的生活，而且还建构着人们对地方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想象，成为一个不断生发意义的空间。以城市为视角，我们不但可以为文学研究找到一个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以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组织社会和文化的意义来透视文学的生成与表现，还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分析城市的文化品格，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利交换关系。更进一步，对分属不同地域和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城市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看清楚其中的知识构成，从不同城市作家的作品中发现其潜在的城市记忆和想象，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城市的身份认同。

王安忆的《三城记》的出版和发行，为我们研究其作品提供了新的突破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快餐的形成，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原则、拜金主义风气，对市民价值观的渲染、改造、对人们审美观念、欣赏趣味的影响，导致了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集体、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脱节，形成了一些不良的或者消极的文学现象。而王安忆作品中城市故事的不同讲法背后所隐含的城市感知经验及其现实性，对我们审美的洗礼，及现实的反思提供了积极的素材。

无论是什么样的作家，如果他出于自身，又囿于自身，那么他的作品很难有突破，也不会写出真正的好作品。只有出于自身而又超于自身的追寻，才有可能达到其目标。王安忆属于后者，她的成名起于“上海书写”，但是这并没有局限于此。《香港的情与爱》、《伤心太平洋》等对于香港、新加坡的城市想象，让我有机会把这三城联系起来，着手研究其城市印象。选择这一角度来研究，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出于其文学价值，王安忆的小说集才气、勇气、傲气与一体，小说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塑造，都有其广阔的存在空间和背景，城市的历史与想象也就成了塑造人物性格，展开故事情节的大舞台；另一方面，文学脱离不了现实，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有其必然的现实意义，

王安忆关于三城的描写，或悲喜、或忧愁，都有其现实的启迪和历史的反思性质。为我们更全面的了解生活的可选择与别无选择、城市的表象与幻想、浮华背后的辛与苦，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本文分为三章，现对其内容和意义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总结：

## 第一章

八十年代崛起的中国作家，王安忆占了一个天时地利的位置。创作成长于后伤痕的年代，文体内容有了更多元化的发展包容性，不需再沉重地审视历史，容许转而以轻省的态度，以女性的感知，书写八十年代前后的中国，实实在在的街头巷尾的小事。她的文字与剧情是通俗易懂的，但是书写的方式确是同时代的作家中多变的一位。

从橡胶园到“花园城市”的新加坡（《伤心太平洋》），小说讲的是三四十年代新加坡一个华人家族的故事，并穿插大量历史素材，使文学有着近乎史诗般的壮阔感，又如同具有强烈抒情意味的亲历记。小说采用诗的意境和散文似的笔法，自序自话，主人公“我”，按照“说城”、“听城”、“想城”、“进城”的叙事模式，一步步走进新加坡，展开对于新加坡的想象，小说中多处用到“也许”，表达了我对于亲人、对于“橡胶园”、对于城市历史的惋惜和无奈。

《香港的情与爱》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讲着相似的故事，只是把故事的背景从台湾搬到了香港。两个相似的故事，两个不同的城市，给我们展示了两幅截然不同的城市想象图。小说以男女主角的感情发展为主线，从试探——交易——相知——分离，一步步走向小说的高潮。写出了香港，这个城市背景下的情与爱。

在《长恨歌》与《遍地枭雄》中，王安忆以上海为基础，重写“创市”——也是“创世”的神话。但是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风格迥异，《长恨歌》是王安忆的早期作品，王安忆曾坦言，《长恨歌》的目标就是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当《长恨歌》以一个昔日的上海小姐几十年的日常生活作为作品主要的架构时，便已然隐含了这样的企图，为上海曾经的一切：“落寞”也好、“琐屑”也罢、在“感伤”和

“颓丧”之外寻出“意义”。面对曾遭“压抑”的上海来说，显然没有比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更有象征意义的了。《遍地枭雄》时间的落脚点则是当代，叙述了一个“出游”的故事，完成了对这座城市的一次寓言式想象。

## 第二章

对于现代性的概念共通的解说，即它体现的是现代的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它一方面具有求新、求奇、求变的特点，代表着变革、进步的趋势，另一方面又有反传统、否定过去、破除常规的特点，具有反常、失序、断裂的因素。城市现代性具有现代性的一般特点的同时，在社会形态上，体现出一种可选择性与别无选择性。商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社会质量的提高，给我们提供更多机遇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更严重的生存危机。

小说无中生有，是建构社会想象、铺陈伦理关系的重要方法。在一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时代里，王安忆有意经营虚拟的文字，重新安顿事物的秩序。来完成她对于城市的想象。三城在小说的虚构中，建构了不同的城市空间，展开了不同的城市想象，却都深刻的体现了城市的现实性。三城是所谓的工商业社会，工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物质主义的生存原则，拜金主义的风气，对市民的价值观念的浸染、改造，对人们的审美观念、欣赏趣味的影响，决定了三城的矛盾性。毛豆，逢佳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个体，他们可以按照现有的社会秩序生活，按部就班的工作，像“机器上某种钉子”。但在商业社会的生活状态中，他们是否有一股模糊的冲动，一种不甘心如此的欲望。所以毛豆“出游”，闯荡他乡，逢佳的为了出国不择手段，都说明了小市民们生活的别无选择。商业城市的背后躲藏着多少忧愁和辛酸。遍地枭雄，那是发迹变泰的时代，秦叔宝，蔚迟恭大江山，梁山好汉聚义，但是二十一世界的中国不见得起义，也容不得革命。所以追求现代，反对束缚，要求自由和革命的毛豆不可能成功。

## 第三章

客观的都市空间结构是指城市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联结状态，是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时空投影，是城市社会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形式。都市空间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观念，对速度和距离的估计也改变了我们



们的美感经验。崭新的特质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物我的关系不断调整，重新影响了我们对外界的认识方法。不同的城市空间给予作家不同的想象空间。

隐晦与呈现是作者在城市空间的影响下所在的选择。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在作者的半隐半现中，更有一层大上海，十里洋场特有的韵味和情调。身份政治与隐含的压抑视角，新加坡的城市空间，影响着作者对于《伤心太平洋》的创作。现代都市是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金钱的法则主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支配着人们的行动。在香港这个金钱社会里。同样处处是金钱法则织下的罗网，金钱的法则扭曲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关系，也令香港变成了一个病态的社会，充斥着病态的人和事。《香港的情与爱》中“良心”成了小说的主轴，男女主角凭良心做事，虽然是金钱交易，但确为我们呈现出一种温馨，感人的画面。

都市的生活结构是由异质的个体所构成的，在都市中人是孤立的、匿名的，我们走在大街上永远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面孔，在这个社会中，非人性的金钱原则支配着人们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短暂的、疏离的，个人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而与此相对照的乡村社会则不同，人与人的关系是亲密的，亲情、邻里之情维系着人们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紧密，给人以安全和温馨之感。人与人的关系是冷漠的，隔阂的，人与集团的关系同样也是金钱原则下的金钱交易。《遍地枭雄》中的大王，二王，三王的遭遇代表着外乡人这一社会集团，他们从对城市的充满幻想到进城后的飘零，都代表着一个社会群体的理想与幻灭。毛豆一个来自经济结构底层的上海人，最后不甘于社会现实的束缚，而“出游”，他的想法不正代表了他那个阶层的人们。

王安忆笔下的三城，不是按部就班的，而是经过作者的空间重组，将城市空间重新组织，不按照原有的布局，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作者对空间的重组，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景观。香港不再是金钱交易下罪恶的集中营，而是一个凭“良心”办事的社会。新加坡在作者笔下不是一个“花园城市”，而是一具大尸体，是海上漂浮的一条死鲸鱼。新加坡的海里埋藏了无数具尸骨，岛屿是海洋里的一个巨大坟墓。上海在作者笔下最是多样的，怀旧的上海是充满欲望和感伤情调的，当代的上海是现代社会秩序中的一架冰冷的机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已成为较有活力的研究领域，不少论者已作出了一些精湛的评析和解读，本文在此基础上，对王安忆中篇小说中的城市想象进行再解读，通过文本分析揭示其创作的文学价值和理论含量。希望通过本人的一点分析和解读，可以为读者展示一个不同的文学视角。



## 后 记

论文终于到了最终定稿的时刻，并没有预想中的激动人心，只是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回想硕士论文全程，琐碎而平淡的工作，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字斟句酌，原本以为会轻松的我，随着论文完成却突然掠起几分遗憾。学术的浪漫情怀在现实面前的折扣不得不让我抱有几分遗憾，而论文也无法像期待中的那样美。作为一名泰籍文学院的学生，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充满了辛苦与无奈，但是也凝聚了我的思想结晶，整个过程怀念起来让我受益匪浅。

研究生两年，一路行来，蔡志成导师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老师学术上的严谨、睿智，特别是老师对理论和实践的宏观把握和微观深入，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并仍满怀希望地对制度的完善进行各种尝试和努力；还有生活中的宽容、幽默，都对我产生重要的影响，让我学会如何平和地做学问和做人。

又该说感谢的话了，不得不落一下俗套，因为我不知道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表示我的感激。对这两年里所有鼓励、帮助我的人说谢谢。感谢所有教授过我的文学院的老师们，虽然我没有完美的学术表现，但心底里我是深深地敬重你们。感谢我的师兄师姐，你们给了我学习和交流的氛围，还有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感谢我的同门，感谢我所工作的学校，给我提供了充分的了解和充足的物质资助。

感谢我的父母，可爱的父亲，可敬的母亲，你们的爱还有那 2000 公里外的期待和守候是我最大的财富，伴随着我走过这些年艰难的求学之路。

理论与实践仿佛学术世界的两只眼睛，或许彼此看不到对方的存在，需要进一步的沟通，但必将比一只眼睛看得清楚。在学术的路上，我永远都只是那个蹒跚学步的孩童，即使迷茫仍睁大双眼，在实践中累积理论，不断向前。